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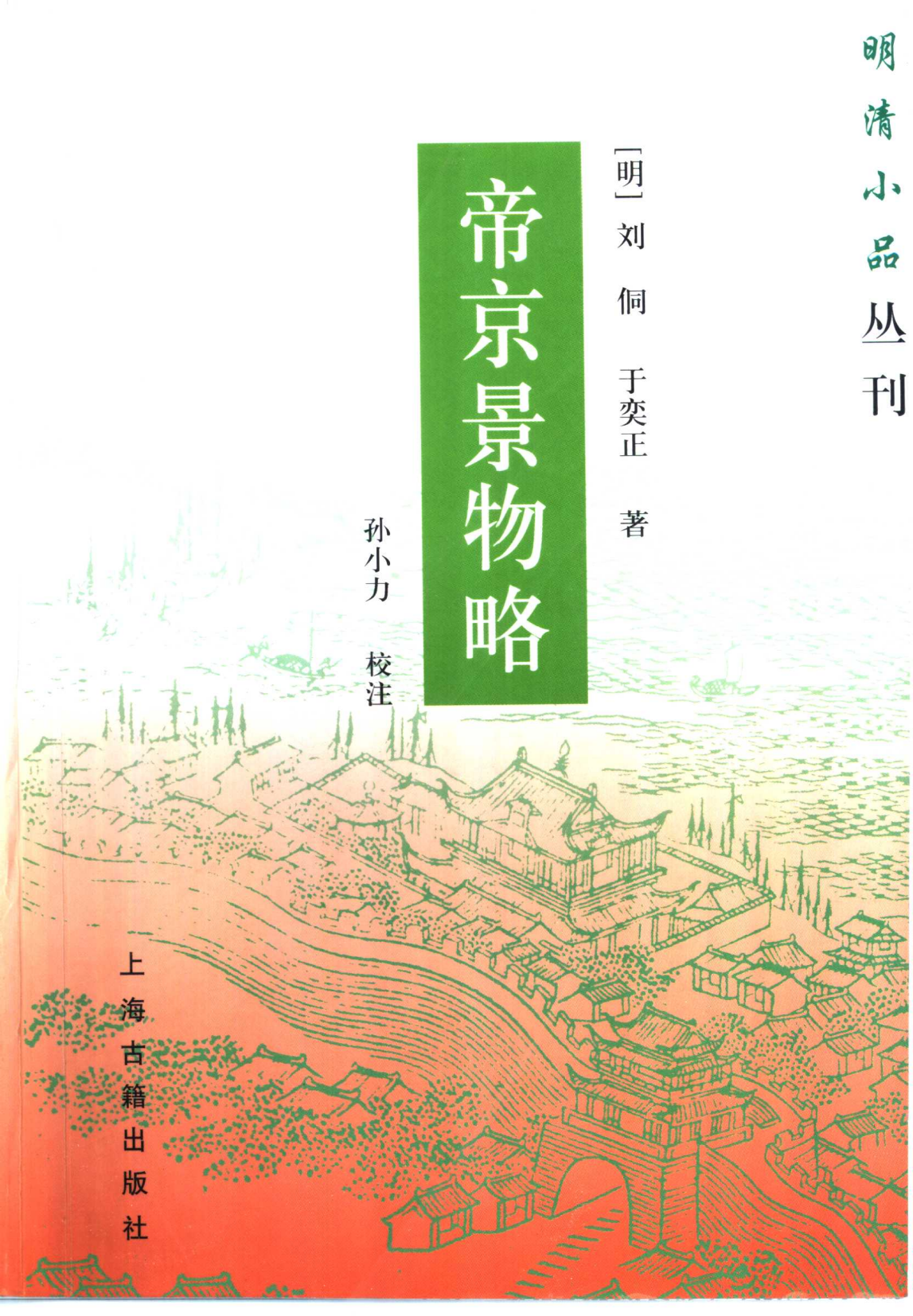
明清小品丛刊

〔明〕刘侗 于奕正 著

帝京景物略

孙小力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清小品丛刊

〔明〕刘侗 于奕正 著

帝京景物略

孙小力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京景物略/(明)刘侗,(明)于奕正著;孙小力
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

(明清小品丛刊)

I.2-9

I. ①刘…②于…③孙… III. 小品文
-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6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6432 号

明清小品丛刊

帝京景物略

[明]刘 侗 于奕正 著

孙小力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625 插页 4 字数 401,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100

ISBN 7-5325-2902-9

G·207 定价:23.00 元

出版说

中国古典散文,自先秦发源,中经汉魏六朝、唐宋,发展到明清,已经进入了其终结期。这一时期,伴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散文园地,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像先秦诸子、唐宋八家那样的天才巨子,但也是作者众多、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再出现过《庄子》、《韩非子》一类以思理见胜的议论文,《左传》、《史记》一类以叙述见长的史传文,以及韩柳欧苏散文一类文质兼胜的作品,但也有新的开拓和发展,散文的题材更加丰富,形式更加自由,从对政治、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对人生处世、生活情趣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又一个以文体为特征命名的发展时期,这就是文学史上习称的明清小品文。

小品的名称并不自明清始。“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浩)读小品,下二百签,皆是精微。”刘孝标注云:“释氏《辨空》,经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可见,“小品”本来是就“大品”相对而言,是篇幅上的区分,而不是题材或体裁的区分。小品一词,后来运用到文学领域,同样也没有严格的明确的定

义,凡是短篇杂记一类文章,均可称之为小品。题材的包容和体裁的自由,可以说是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可以包括许多具体的文体。事实上,在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文体,如尺牍、游记、日记、序跋,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的文体,都可以成为“小品”。明人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就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散文、韵文的文体。尽管如此,从阅读和研究的习惯来说,小品文还是有比较宽泛的界定,通常所称的小品文,主要还是就文体而言,指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情趣盎然、韵味隽永的散文作品。

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兴盛,在明清时期,主要在晚明阶段。而小品文的渊源,则仍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一些精采的短章片断,可以看作是后世小品文的滥觞。六朝文人的一些书信、笔记之类,如《世说新语》中所记的人物言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读〈世说新语〉》),更是绝佳的小品之作。唐代小品文又有长足发展。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堪称山水小品中的精品。晚唐时期,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人的小品文,刺时讽世,尖锐深刻,在衰世的文坛上独树一帜,“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宋代文化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而其中代表宋代文化最高成就的苏轼,就是一位小品文的巨匠。苏轼自由不羁的性格,多方面的文化素养,使小品文这种文体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创作出大量清新俊逸之作,书画题跋这一体裁更是达到了极致。以致明人把他推为小品文的正宗,编有《苏长公小品》。宋代兴起的大量笔记,不少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为小品文的兴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MAC84/66

把小品文作为一种文体加以定名,并有大量作家以主要精力创作小品文,从而使小品文创作趋于繁荣,还得到晚明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有不少作家把自己的著作径以“小品”命名,如朱国祯的《涌幢小品》、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王思任的《谑庵文饭小品》等;还出现了不少以“小品”为名的选本,如王纳谏编《苏长公小品》、华淑编《闲情小品》、陈天定编《古今小品》,陆云龙编《皇明十六家小品》等。而作为小品文达到鼎盛阶段标志的,还得推当时出现的许多具有很高文学成就的小品文作家,如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袁”和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以及同时或稍后的屠隆、汤显祖、张大复、陈继儒、李日华、吴从先、刘侗、张岱等,均有小品文著述传世。晚明小品文的主要特点在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极富创造性。晚明小品虽然在思想内涵和历史深度方面,无法与先秦两汉散文、唐宋散文等相比;但在反映时代思潮、探寻人生真谛方面,同样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社会风尚和思潮的影响分不开的。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市民意识的增强,是晚明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之后,天翻地覆的巨变使社会思潮产生了新的变化,晚明的社会思潮和文学风尚得到了新的审视;同时,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仍有一部分作家仍然继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作出既有晚明文学精神又具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如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余怀的《板桥杂记》、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沈复的《浮生六记》等,或以其潇洒的情趣,或以其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

明清小品文不仅是中国古典散文终结期时的遗响,而且也是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转换中的重要一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不少散文作家都喜爱晚明小品,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认为晚明文学运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些相似之处。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更曾掀起过一阵晚明小品的热潮。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作家大力提倡小品与幽默,强调自我,主张闲适,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林语堂等人的观点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评。但鲁迅先生对小品文本身以及晚明文学的代表袁宏道等并不持否定态度,而是认为“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不够”(《一思而得》)。鲁迅先生是把战斗的小品比作“匕首”与“投枪”,他晚年以主要精力创作杂文,正是重视小品文作用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文坛上又出现了一阵小品随笔热,明清小品的价值在尘封半个世纪之后重又为人们所发现,并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估。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明清小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给广大读者提供较好的阅读文本,我们特出版了这套《明清小品丛刊》。

本丛刊精选明清具有较大影响和具有较高欣赏价值的小品文集。入选本丛刊者,系历史上曾单独成集者,不收今人选本。入选的小品文集一般根据通行本加以校勘,所据版本均在前言中予以注明。一般不出校记,重要异文则在注中注明。由于明清小品文作者多率性而作,又多引用前人诗文及典故,所论又多切合当时社会风尚,为给读者阅读提供参考和

146

帮助,特对入选的小品文予以简注,对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典故、术语加以简明的注释,语词一般不注。明清小品文集的校注工作是一项尝试,疏误之处当在所不免,殷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在明清小品名著之中,《帝京景物略》以其内容广泛而著称。作者以城北内外、城东内外、城南内外、西城内外、西山上下、畿辅各地为先后顺序,采用客观描述的笔法,将明代北京以及周边各州、县的重要名胜古迹和富有情趣的风俗民情,尽数作了介绍。

北京名胜景观的记录,是本书的重点。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北京各地的寺庙祠堂、山川风物、名胜古迹、园林景观,甚至河流桥梁,许多今天脍炙人口的历史古迹和山川名胜,诸如卢沟桥、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鹫峰寺、卧佛寺、戒坛、十刹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我们都能从本书探寻到它们的渊源所自、本来状貌、风格特征和历史变迁。而且因为本书作者的写作态度比较严谨,所以作为明代北京的地方史料,一直受到重视,明代以后凡是记述北京历史风土景物的书籍,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或参考过本书,就足以证明它的价值。

例如本书对于明代北京园林的记录,就是难得的史料。尽管明代中期以后,建园已成为各地城镇富裕居民追求的时

尚,但是在北方,有心为自己的园林留下文字记录的人毕竟不多,至于留心叙述描绘当地众多园林的人士则更少。因此,本书为我们留下的明代北京园林资料,就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可以从中了解明代北京人士的建园思想、园林风格,可以用来和江南园林相比较,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比如说,北京园林自有北方园林的特点,与江南园林相比,它们较为粗放浑朴,不够精致,其极端者,即“荒荒如山斋”的“定国公园”;它们不尚小巧,追求宏大,如将园内园外打成一片,以一亭、一轩、一台而周览四方的“英国公新园”;它们不求景观建筑和景点景色的繁复多样,而于单调中求变化,在布局上出新意,如纯粹以柳取韵的“白石庄”。北京园林多为皇亲贵族所建,常常追求建筑的数量和奢华的气势,如“李皇亲新园”以“梅”争胜,似乎企图创立雅洁的风范,然而却将亭、池、门、窗甚至墙壁,都塑造成梅花形状,未免雕琢太过;此外,亭如鸥,台如凫,楼如船,桥如鱼龙,还有数百间的长廊,均显示了贵族园林灼人的气焰。凡此种种,都与崇尚清雅风范的江南园林有很大差异。

园林之外,有关寺庙祠堂的篇章占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因为明代历朝的太监和外戚,大多热衷于修建佛寺,尤其神宗之母孝定李太后,虔心事佛到了相当痴迷的程度,因此北京寺庙的数量十分可观。北京寺庙的种类也相当多样化,表现出京城文化不拘一格、广收博取的特点。其中既有保持纯粹宗教色彩的佛寺道观,也有一些主要是反映民间信仰的,如祭祀火德真君的火神庙、祭祀历代名医的药王庙、祭拜所谓真人的灵济宫、供奉萨真人和王灵官的显灵宫,以及崇奉关羽的关帝庙等等。至于帝王庙、朝天宫、悯忠寺和皇姑寺,则明显

反映出京城寺观独有的帝王色彩。即使是同一宗教的寺庙，也常常因为教派或主创者的差异，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同是佛教寺庙，双林寺由于创建者左吉古鲁来自西竺，就有浓厚的域外色彩；真觉寺因为专供西番板的达居住，就按印度式样建造；洪光寺建自朝鲜人郑同，遂有金刚山千佛绕毗卢之翻版；摩诃庵住持为诗僧琴僧，因而具有“高轩待吟，幽室隐读”的风格；崇国寺相传为元代脱脱丞相故宅改建，因此其中的塑像居然就是脱脱夫妇的化身。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除了园林寺庙、山川景观之外，本书涉及的内容还有许多：《灯市》记录元宵夜五花八门的彩灯烟火，《高粱桥》介绍民间艺人的各种杂耍技巧，《春场》叙述当时北京一年四季的民俗节日以及活动，《太学石鼓》综述历代人士对于石鼓文的考辨，《天主堂》涉及基督教的常识以及耶稣会士带来的稀奇古怪的玩艺，《城隍庙市》几乎将明代五花八门的工艺名品以及知名工匠网罗殆尽，《汤泉》从遵化县的温汤引申至形形色色、遍及国境内外的著名温泉，至于《胡家村》，简直就是一篇专门的“蟋蟀经”。

尽管本书是以记录北京景观风物为主，但也不时穿插有对明末社会、政局的思考，表现出作者对于明代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例如卷八《督亢陂》中，作者从眼前北方上谷之地“水流时断，林烟时见，禾黍时有”的荒凉，回想战国时督亢陂的富饶肥沃，感慨万千。他从当时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思考起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然而枣栗之民，粒食东南，东南之粒，能饱九边士，亦能荒三辅土。”南粮北输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北方人士的依赖心理，削弱了他们生产自强的动力，当时很少有人会这样

想到。

再如卷八《李卓吾墓》，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于伟大思想家李贽的仰慕与惋惜。篇末附有作者于奕正的挽诗，诗曰：“此翁千古在，疑佛又疑魔。……书焚焚不尽，老苦苦无多。潞水年年嘯，长留君浩歌。”李贽那种似佛又似魔的人格魅力，给予作者深刻影响。因为关心政治、关注时事，刘侗、于奕正后来都参加了复社；因为崇尚李贽超凡脱俗的行为方式，于奕正也曾以那种骇世惊俗的言谈举止出现于友朋中间。

又如卷七《瓮山》篇，摘录当时民谣以反映明代社会的某些变化：“传者谓弘治时世臣富，正德时内臣富，嘉靖时商贾富，隆（庆）、万（历）时游侠富。然流寓盛，土著贫矣。”晚明的流民问题以及作者的困惑，于此可见一斑。此外，《火神庙》关于火灾，《三忠祠》、《卢沟桥》关于治水，《首善书院》关于讲学和天启年间的党争，《李文正公祠》关于宦官乱政等等，都与社会时事紧密相关。

本书的文采也值得称道，竟陵派幽雅隽洁的文风，于本书表现得十分充分。尽管明末以后，褒奖竟陵派的人士很少，但是竟陵派抒情求真、描写求雅的文学主张及其实践，还是不容轻易否定的。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文人纪昀，在贬斥公安、竟陵为“伪体”、为“诡俊纤巧之词”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本书“序致冷隽，亦时复可观”，同时认为公安、竟陵之文，适合于小品点缀，“寸有所长，不容没也”（纪昀《帝京景物略》删节本序）。可见竟陵小品的魅力，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本书那些写景的部分，文笔洁净隽永，耐人寻味，不少篇章可以作为晚明小品文的典范来欣赏。

如《香山寺》写香山来青轩观景所见：“至乎轩，山意尽收，

如臂右舒，曲抱过左。轩又尽望：望林转转，望塔芊芊，望刹脊脊。青望麦朝，黄望稻晚，晶望潦夏，绿望柳春。望九门双阙，如日月晕，如日月光。”对于山势形状的拟人化描摹，叠音词、颜色词的灵活运用，能够启发读者许多充满诗意的联想。

再如《定国公园》写园之“质朴”：“园在德胜桥右，入门，古屋三楹，榜曰‘太师圃’。自三字外，额无扁，柱无联，壁无诗片。西转而北，垂柳高槐，树不数枚，以岁久繁柯，阴遂满院。藕花一塘，隔岸数石，乱而卧。土墙生苔，如山脚，到涧边，不记在人家圃。”此段文字雅洁，与后来张岱《陶庵梦忆》中反映无锡王稚登园林风貌的《愚公谷》篇十分相似。（按：天启年间，张岱二叔张尔葆在北京与谭元春、于奕正、袁彭年等时常聚游酬唱，张岱受其影响，因而偏爱竟陵派诗文。）

又如《白石庄》写“柳”：“庄所取韵皆柳，柳色时变，闲者惊之；声亦时变也，静者省之。春：黄浅而芽，绿浅而眉、深而眼；春老，絮而白。夏：丝迢迢以风，阴隆隆以日。秋：叶黄而落，而坠条当当，而霜柯鸣于树。”柳韵、柳色、柳形、柳声，以及观柳人因为柳的变化而引起的内心悸动，描摹得如此细腻到位而又如此简练，实属罕见。

本书其实是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切磋、分工合作的成果。

主笔刘侗（1593—1636），字同人，号格庵，麻城（今属湖北）人。早在为诸生时，其才学即受督学葛公赞赏。谁知后来事情的发展，正应了一句老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文采出众，反倒招惹了麻烦，礼部以此奏参，罪名就是“文奇”，万历四十六年（1618）省试，刘侗与景陵（即竟陵，明代作“景陵”）谭元春、黄冈何闵中同时被降低等次，而且因此遭人

妒忌，一时“祸患缠身”（谭元春《与孟诞先》），无法在当地立足。崇祯初年，为了获得一个合适的应举考试环境，他毅然北上京师，相伴同行的，就是后来为《帝京景物略》查访搜集有关诗歌的周损。到京城后，刘侗捐资成为太学生，并在北京整整逗留了五年。在此期间，通过谭元春的介绍，又结识了本书另一作者于奕正，并成为好友。他们共同游玩名胜，踏勘古迹，访贤问老，搜集资料，为本书的撰写打下了坚实基础。崇祯六年（1633），刘侗考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为进士，授职吴县知县。这年秋天，由于奕正相伴南归，取道金陵，二人又在金陵滞留了整整一年，这一年的主要任务，就是撰写《帝京景物略》。崇祯八年冬天，《帝京景物略》终于结稿，并在金陵顺利出版。当时根据于奕正的计划，还想与刘侗合著《南京景物略》，如此既有“北京”，又有“南京”，方为完整。不料于奕正突然谢世，刘侗也没能到吴县走马上任，随后病逝于维扬客船之上，于是他们的计划就永远地成了梦想。除了《帝京景物略》之外，刘侗的著作还有《龙井崖诗》、《雉草》和《韬光三十二义》，谢世之后，由他的朋友孟登、谭元礼先后刊行于世。

刘侗为人正直，志向远大，所谓“上尊性命不易之理，次究著述千秋之业”（《谭元春集·答刘同人书》），既是他择友的标准，也是他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倾心于文学创作，诗文力求格调新颖，所谓“幽古奇奥，无一字拾人残滓”（《光绪麻城县志·文苑传》）的风格，在《帝京景物略》里也有突出的表现。与其说这是因为受到了当时风行的竟陵派的影响，其实不如说刘侗本人就是典型的竟陵派，因为竟陵派领袖与刘侗并不是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而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的朋友，是共同支撑竟陵大旗的中坚人物。刘侗与竟陵派领袖谭元春是

莫逆之交，他们一起因为文风奇特受到处分，他们经常有诗文唱和、书信往来。谭元春在北京时，和刘侗一起经常借住在于奕正的家园里，并且不止一次直接或间接地称赞刘侗。刘侗北上京师时，他有《送刘同人北学四十二句》诗，表述了对刘侗当时处境的同情，并寄予厚望，诗中说：“去负一卷文，徒步作燕客。失意走踆踆，气平不可阨。楚场鬼遮烛，贫贱生戈戟。……太学数百人，睁眼看珠壁。雄文写磊磊，宗庙护手迹。”（《岳归堂新诗》卷一）他曾在回复刘侗的书信里表达仰慕之情，自称“仆甚心仪”，并赞赏刘侗“才大而品坚”（《答刘同人书》）；他还在给友人孟登的书信里，说“同人祸患缠身，才格益高古”（《与孟诞先》）。处境的相似，文风的相近，一致的追求，促使他们成为多年的知交。

刘侗的合作者于奕正（1597—1636），原名继鲁，字司直，宛平（今北京）人。明崇祯初年宛平县学生员。早年丧父，让财与兄弟，独居荒园之中。作为北京破落的世家子弟，于奕正有着迥异于常人的嗜好和性格。他无心理财营家，喜欢交友，好游名山，交游皆当时名人。谭元春、刘侗二人来京师，必客其园。当时四方来京师者，闻其名上门拜访，多留宿其家，高谈阔论，吟诗诵文，还乡后则向他人称道，于奕正亦乐此不疲，于是“天下益向往之”（顾与治《朴草序》）。于奕正状貌奇特，不修边幅，初次见面者，往往惊诧回避，但不久必然为其出众的言谈所倾倒。顾与治在为于奕正的诗集《朴草》撰序时，曾生动描述于奕正初次到他家作客时的场景：“予坐客未识司直者，见其蓬鬓电目，面作松鳞，瘰处颌左，衣冠率略，顾瞻倨蹇，愕睨欲避之。已而道风披扬，绪论叠出，莫不倾倒叹服，徘徊不能去。”

于奕正是性情中人，常常不循常理行事。崇祯七年（1634）重阳日，刘侗中进士后离京南归，于奕正依依不舍，送至郊外河边。见秋色迷人，忽然游兴大发，于是同舟相伴而去，也没顾及向家人辞别。在金陵，曾遍游名胜，遂有《南京景物略》之构想。后来刘侗与他分道而行，于奕正只身独游，因此心情不能舒畅。崇祯九年（1636）四月闷闷不乐地返回金陵，随即病逝于刘侗所居客店，年仅四十。除了《景物略》，于奕正还有《天下金石志》、《朴草》等著作行于世。

刘侗于序文中称，他本人“北学而燕游者五年”，而于奕正是燕人，有“二十年燕山水间”摸爬滚打的经验，于是他们分工十分明确：“奕正职搜讨，侗职摘辞。事有不典不经，侗不敢笔；辞有不达，奕正未尝辄许也。”可见《帝京景物略》虽是刘侗执笔，但资料的搜集、体例的确定，以及成文以后的修改，于奕正实在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于奕正对此也颇有感触，其《略例》中所谓“（是编）布体陈辞，不更蹶向人一步”，所谓“成斯编也良苦”等等，并非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辞，确实是多年辛苦终成正果之后的感慨。

本书的另一位合作者是周损。周损，字远害，号迂收。博学，工诗文，与刘侗是同乡兼同学，曾共砚席十余年。刘侗赴京入太学，周损相伴而游。又共著《帝京景物略》，采选诗歌，皆出其手。当初周损搜集有关诗歌多达五千余首，最后从中挑选录用的，仅为五分之一，周损之勤勉与严谨，于此可见一斑。崇祯十二年（1639），周损考中举人，又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中了会试副榜（《光绪麻城县志·仕绩》谓周损中“癸酉会试副榜”，误。当为“癸未”），授饶州府推官。任职饶州期间，曾因马士英军队骚扰百姓并欲屠城一事，与上司交涉，并

设缓兵之计，成功制止了杀戮之举。临终，勉励其子力学敦行，无一语涉及家事。因此颇受乡人好评。

《帝京景物略》的撰写前后经历了六年，“盖周咨于燕者五年，著于秣陵者经年，而成书”（方逢年叙）。崇祯八年（1635）冬天初版刊行之后，明末清初翻刻过数次。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夏天，纪昀又将原书删订出版，把大量附诗全部删除，“独留正文一百三十余篇”，并添了少许注释，作了部分改动，成为后来流行的版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古典文学出版社曾根据纪昀删节本整理出版了排印本。

本书经过今人整理的、质量较好的版本，是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校点本，根据张次溪先生所藏明崇祯八年初刊本整理。此本校对严谨，“没有删节，个别刻印上的错失，则据清刻本校改”（见书前《出版说明》），较好地保存了原貌。但是，北京出版社一九六三年校点本并非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首先，该校点本所依据的底本（即张次溪先生藏本），固然是初刊本，但印行并非是在明代，因此没能完整地保存原貌。原书某些在清代易于招惹麻烦的段落句子，不同程度地被删削篡改，证明张次溪先生藏本必定是清人对原版作过挖改以后的印本。例如，卷一《太学石鼓》强调明代礼教科举对于邻国、少数民族的影响，说：“其声教迄四海之外，琉球、交趾、啰啰、乌撒等，遣子入学，有举制科。归其国者，古莫比也。”这一段文字，该校点本中全不见踪影。又如，卷四《帝王庙》篇，就嘉靖年间撤去元世祖忽必烈与其大臣庙祀一事，援引礼科给事中陈秉与皇帝的对话：“‘胜国元以夷乱华，不宜庙祀，宜撤忽必烈及其臣木华黎等五人神主。’上曰：‘元本胡夷，甚于五季。’”这一段文字在该校点本中亦付诸阙如。此外，类似的删改还有多